

---

# 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

——读《四联总处史料》

魏宏运

---

—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大致可以分为1927—1937、1937—1945、1946—1949三个时期。在国民政府变换频仍、纷繁杂存的经济行政机构中,有一个几乎与后两个时期共始终的,对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发生过重大影响,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金融领域发挥过特殊作用的机构,这就是四联总处。

四联总处,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经济史学界对它亦重视不够,甚至从事抗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对它也还感到陌生。1986年南京“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青年学者黄立人(《四联总处史料》的主编之一)发表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四联总处》,大概是对四联总处这一机构进行专题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可能是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史料,尔后出版的几种民国经济史著述,尽管都已注意到了四联总处的重要性,但在论述这一机构时仍缺乏深度,均难以对这一机构的背景、性质、特点及历史活动和作用,作出全面的考察和评价。

《四联总处史料》的问世(全书170万余字,上、中、下三卷,档

案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填补了民国经济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史史料的空白,为研究四联总处提供了系统丰富的史料。

通观四联总处十余年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个机构曾具有的一些特征:从其被蒋介石规定为“决定政策”、“指示方针”、“考核成绩”来看,它的任务主要是规划、决策国统区经济的大政方针,对经济进行宏观指导和控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曾参与了大量的微观经济活动,如收兑金类,审核外汇,购办生产原料,核定具体贷款项目等等。它被授权督导和考核国家行局,“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而实际上,它不仅督导国家行局,而且参与管理商业行庄和金融市场;不仅办理“特种业务”,而且办理普通业务;不仅在金融领域内发挥过特殊作用,即在整个经济领域里也都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名义上是四行联合办事机构,其机构级别也并不在国家法令赋予主管全国财政金融权限的财政部之上,但它的特殊阵容,使它比其它经济、金融行政部门具有更广泛的权力和超乎寻常的权威。四联总处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它其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成为那个时代国统区金融和经济的结合点,成为国统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点。正因为如此,收集和整理四联总处的史料,研究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并以此为出发点、突破点,进而研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国统区经济史、金融史的演变,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了。

## 二

粗读《四联总处史料》即产生一个印象,那就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金融极端重视。早在抗日战争之前,这个集团就与银行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蒋、宋、孔这些曾经以各种不同经历混迹于金融界而熟知银行“神奇作用”的人们,正是靠了江浙财阀的“钱柜子”扶持,才得以把革命打入血泊中,登上了统治阶级的宝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各派新军阀的混战中,蒋介石集团之

所以能常操胜券，力压群雄，原因之一，就是能挟国家“钱柜子”的威力，凭借财大气粗而得以软硬兼施。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在中国辽阔、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建立抗战后方，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更加重视金融的作用，反复强调金融经济密不可分，强调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配合和支持。七七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即手令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组建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协调四行动作，集中国家银行的资力应付危局，安定金融，稳定经济，支持抗战。1939年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大后方经济已基本完成由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进入了漫长而困难的新阶段。此时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改组四联总处，明确规定了四联总处组织机构的组成和职能。改组后的四联总处名义上仍然是四行的联合办事机构，但在职能、性质和地位上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四联总处的最高领导层——理事会，集军委会、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和国家行、局的首脑于一堂，并由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处史料》提供的材料可以充分表明，四联总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总领战时经济、金融的中枢决策机构。

人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头上顶了许多显赫的头衔，曾任过国民党总裁、军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诸要职。除此之外，还有一顶人们比较陌生，但却十分重要的头衔，就是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如果把战时大后方经济喻为一架庞大的经济机器，四联总处就是启动和调控这架机器的“钥匙”。掌握和运用这把“钥匙”的正是蒋介石本人。对掌握和运用这把“钥匙”的情况，《四联总处史料》记载得淋漓尽致，这些都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决策和处置重大经济、金融事项的内幕材料，往往是治史者苦苦搜寻难得见到的，或见之甚少的。

1939年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订“经济三年计划”、“金融三年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四联总处制订的这两个计划，规定了1940年至1942年经济、金融的大政方针，实

际上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指导经济、金融活动的主要思路和基本依据。金融计划理应由四联总处拟订，但经济计划不是出自经济行政部门，而是出自四联总处之手，这决非偶然，其一说明了四联总处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经济领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其二说明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处置经济问题的习惯和传统思路，总是把金融放在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导地位。

研究蒋介石统治集团如何按这一“思路”指导经济活动，以及研究以这种思路指导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后果，应该成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从抗战史研究的角度说，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抗战时期金融史的研究。如果学者们又愿意涉足这一课题的话，那么读读《四联总处史料》是会很有所裨益的。

### 三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处在一个非常特殊和困难的环境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对外交通基本断绝，外援受阻，大后方经济危机日趋深重，及至抗战后期几接近崩溃边缘。关于大后方经济由兴而衰的历史演变，已是无须置辩的历史事实；至于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诸多原因，学者多有论述，不乏智者之见，一些主要问题近年来已基本达成共识。读过《四联总处史料》，却使我从另一角度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在中国最贫困的西部地区重新建起国统区经济，在旷日持久的战争摧残和对外交通阻隔双重压迫之下，能够坚持八年之久而免于最终崩溃，个中缘由很值得探讨。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四联总处第 338 次理事会上说：“在八年抗战中，我们中国金融、经济之所以能免于崩溃，大部分是由于各行局能同心一德，照四联总处之计划，努力推行的结果。”大后方金融、经济能免于崩溃的历史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的这个结论恐有失偏颇，但它至少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答案：那就是国民政府对战时金融、经济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的重大影响和作用。这在《四

联总处史料》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里仅举一例。

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粮食和粮食价格在国民经济和市场中起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是旧中国那样发展落后的农业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战时大后方粮价的涨落直接关系到军需民食,更直接左右着大后方市场物价的波动。1939年大后方粮价开始大幅度上涨,1940年以后,粮价更以成一倍几倍的幅度狂涨。以战前粮价平均指数为100,1939年为167.3,1940年为533.45,1941年为2130.58。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抑粮价的措施,但收效甚微。面临越来越涨的粮价和军粮民食匮乏的危机,国民政府一时手足无措,有关部门拟订了“筹集军粮计划”和“非常时期粮食管理法”,准备在大后方实行“粮食公有”,禁止自由买卖粮食,发行粮食证券,强行征集军粮。该计划和办法交四联总处审议后,以为大后方的环境“并不能构成公有之条件”,如果冒然实行,收购粮食所需巨款、储藏粮食所需仓库、运输粮食所需工具、管制管理所需人力等等,均难以设想,不仅在“技术上有困难”,“有窒碍难行之处”,更重要的是,发行粮食证券会助长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法币制度深蒙其害”。其原因在于:拟议中的粮食证券允许抵押转让,银行为抵押放款付出法币,其结果与政府高价收购粮食并无二致,无异于为通胀火上浇油;如果加以修正,规定不准抵押转让,“又不易取信于民”,打击农民种粮上赋的积极性,难收实效。有鉴于此,四联总处认为:“发行存粮证券计划,无论从技术或政策上研究,目前均不宜采行”,惟为从根本上解决战时军需民食计,“最适当之办法,莫如田赋改征本色”,并对实行田赋征实的优点和办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四联总处签署暂缓发行粮食证券,提出实行田赋征实不久,行政院第409次会议即通过了“各省田赋得酌征实物,其征率分别专案核定”案,开始在大后方实施田赋征实。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最重要的财政经济政策之一,尽管它有其加重农民负担的一面,但它使国民政府得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好处:一是基本上保证了军粮民食的供应,二是节省了

为购买粮食支付的巨额法币，增加了财政收入，缓和了国民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舍此，很难维持法币制度和避免大后方经济基础的崩溃。据统计，1942—1944年田赋征实估值所占国民政府各年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32.65%，49.14%，54.68%。

诸如此类宏观决策、调控关系大后方金融、经济兴衰安危的例子，在《四联总处史料》中有许多记载，如货币供应和回笼货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处置沦陷区法币的对策，统一发行和国家银行的专业化分工，对敌货币战经济战的谋略，开发大后方经济和消除经济危机的投资和贴放政策，管制和平抑物价的措施和办法，推进存储和缓和通胀，等等。从《四联总处史料》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所制订的一系列宏观金融、经济政策和所实行的一系列战时统制和宏观调控，有些是有效的、成功的，有些是无效的、失败的。如在对敌经济作战中建立战区经济委员会和经济游击队的作法，结果证明是适得其反。平抑物价从总体上来说失败的。就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决策的总体而言如何评价？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蒋介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抗战的成败，“七分”在经济，“三分”在军事。经济不垮，大后方半壁江山就不会垮，抗战的局面就不会垮。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的作为，虽然都不能说干得“漂亮”，但比较而言，前者胜于后者。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待于史家评说。

#### 四

战前，国民党统治集团主要通过设立中央银行；改组中、交二行；改组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实行法币制度等步骤，基本上建立了垄断全国金融的体系，但拟议中的“银行的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因抗战爆发而搁浅。蒋介石要建立“金融总枢机构”的宿愿，未及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在四联总处的主持下，主要通过如下步骤，完成了对金融的高度垄断，把中国近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带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首先,通过实施公库法,由中央银行经理国库;推行轧现制度,由中央银行担当总轧帐;实行“中央银行办理票据交换办法”,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票据交换;统一法币发行权,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由中央银行集中保存四行存款准备金等步骤,使战前“羽毛未丰”的中央银行基本上具备了“银行的银行”的职能。

其次,在提高中央银行地位的同时,对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实行了专业化分工,明确了各自的主要职能,划分了彼此的业务范围,奠定了国家银行体系的基本格局。

第三,对银行实务进行了中国金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设计和规范。四行二局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在人事制度、会计制度、业务程序等方面相沿成俗,各行其是,难于对其进行监督和考核。特别是内地的商业银行,许多是由旧式的钱庄、银号、商号和货帮演化而来,更是积习陋俗甚深,具有强烈的封建性。四联总处有鉴于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人事制度、会计制度、稽核制度、业务程序、职业培训等方面,厉行改革,划一规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筹设票据市场和证券市场。

四联总处在金融领域内的活动,既有其强化官僚资本对中国金融的垄断的一面,也有促进中国金融业现代化的一面。由中央银行调控全国金融的体系的建立,从金融制度史和银行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进步。《四联总处史料》有关的详尽记录是留在中国金融史和银行制度史上的重要篇章,的确是从事金融史研究的学者必读的东西。

## 五

由于业务上的来往和学术上交流的机会,我与《四联总处史料》的部分编者熟识,了解一些该书的编辑情况。

该书由重庆档案馆编研处与重庆市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合

作编纂,前者长于治档治史,后者长于金融理论和实务,两者各展所长,有机结合,发挥了编纂者主观能动性,为高质量地完成这套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编辑难度较大的史料著作,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证。

该书选材系统全面,重点突出,注意了点面结合,多角度地向学者提供有关史料,它分类编排资料科学,合理,既照顾了历史演绎的逻辑性,又考虑了专业分类的要求,方便读者检索。该书在编辑方式上,采用了节录与全录相结合、以节录为主的方式。节录这种方式虽然增加了编辑的难度,但却可以给编著者更多的贯彻编辑思路、施展编辑技巧的余地,既便于按问题分类,又达到了精选史料、增加全书信息量的目的。该书对一部分重要和珍贵的档案则不吝全录,便于读者一窥“全豹”。

该书的代序《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潜心研究,达到较高学术水平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文作者黄立人同志,主持和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档案汇编的编纂,在民国经济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于1985年发表的近3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历史评考》,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较早重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进行客观的总体研究的文章,引起一定的反响,对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民国经济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作者奉献给我们的这篇4万余字的《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虽以四联总处为题,但立意高,意在通过解剖四联总处这一“金融和经济的结合点”、“宏观金融、经济和微观金融、经济”的“结合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考察和研究国民政府的金融、经济政策和大后方经济史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有理论深度,反映出作者近年来在抗战时期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长足进步。该文对四联总处的产生和所处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对四联总处组织机构和职能的分析;对四联总处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地位所作的评价,为读者阅读该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线索,不失为《四联总处史料》一个很好的导



读指南。

总而言之,通览《四联总处史料》,可以看出编著者们所具有的经济学、金融学、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修养;金融和银行实务的专业知识;文献整理和编纂的技能;驾驭重大历史研究题材的功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 170 余万字的巨著所包含的编著者们的艰辛劳动。该书从 1985 年开始搜集材料,到 1992 年定稿,1993 年才正式出版,真是十年修书,方成正果,殊属匪易!参加该书编著工作的五位同志,有三人已退休,有一人因积劳成疾,书未成而人先去,没有能目睹该书的问世。

历史科学的大厦需要坚实的史料基础。每念及此,我都想从内心对这些默默无闻地从事史料整理,甘为人作嫁衣裳的同志们说一声:“谢谢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系)